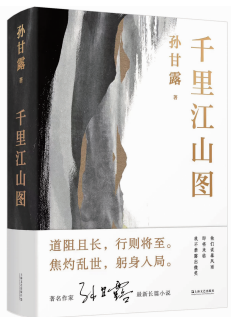


# 孙甘露:比小说更加艰难的时刻



作家孙甘露

作家孙甘露的长篇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自出版以来,文学界、评论界、新闻界热议不断,随着小说于今年8月摘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,又引发了新一轮关注热潮。目前,《千里江山图》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乃至评弹等各种艺术“版本”正在接力绽放,而在喜马拉雅播送的同名广播剧已经接近尾声。10月22日,孙甘露携《千里江山图》来到书中故事发生地之一的南京,与读者见面,并与毕飞宇、叶兆言等作家老友交流。

孙甘露一直被定义为先锋作家,以《访问梦境》《信使之函》《请女人猜谜》等极具实验性的作品,确立了他在先锋作家群体中“最先锋”的形象。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出现,被看作先锋作家向“红色历史题材创作”的新探索。小说描写了1933年上海特别行动小组实施“千里江山图计划”,克服各种苦难危险,将中央领导人从上海撤离到瑞金苏区的故事。

“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,远比小说精彩得多、复杂得多”,孙甘露表示。上世纪30年代初,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,这是历史上非常秘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。从上海到瑞金,直线距离一千多公里,但在当时必须绕道香港、汕头等地,这样就是三千多公里。毛泽东有一个说法:交通线是苏维埃的血脉。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。

同为先锋文学的主将,一起参与过上世纪八十年代“文学革命”的叶兆言,对于老友孙甘露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似乎了然于胸。

“我没有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间谍小说”,叶兆言称,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,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,以及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;《千里江山图》所写的路线,正是中国革命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去,“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”。作为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爱好者,叶兆言谈《千里江山图》,联想到卡彭铁尔的《追击》,《追击》采用了与贝多芬《英雄》交响曲各乐章相呼应的故事结构,叶兆言认为《千里江山图》里也有一股“英雄气”贯穿着小说的故事发展。

虽然孙甘露一再提及,他不是刻意要写一部谍战小说,而是小说背后的“本事”已经足够曲折复杂、惊心动魄了,“如果大家读了小说之后,能对这段历史有兴趣,我觉得就很好。”不过正如叶兆言所说,小说不是简单地重复党史,“如果不是想了解这段历史,不如去读历史书”,因此他认为孙甘露的小说,关键还是“怎么写”的问题。从当年的“梦境”走向“千里江山”,对于孙甘露的此次“转场”,叶兆言用了一个词形容:“放心”。“写什么不重要,一个人修行很重要。孙甘露的文字有变化,但不变也就不是孙甘露了。”

先锋时期的孙甘露,亦如他

自己所谈:“鲜明的人物,典型的形象,有起承转合的故事。我从来就没有写过那种东西,而且我脑子里也没有那种概念。”时隔25年推出的这部《千里江山图》,一改孙甘露往日作品面貌,悬念迭出,步步惊心,塑造的一批地下党人各具特色、形象鲜明。

“我不认为一个习惯了先锋叙事的作家转向现实叙事,尤其是去写这样一部特别强调故事性的小说,是件容易的事。”毕飞宇现场称,“假如我来编这个故事,未必能把它从头到尾编好。”一个作家放弃了他所熟悉的那套小说修辞,建构一个全新的小说模式,毕飞宇认为这非常难得。“从一个普鲁斯特那样闭着眼睛写作的人,转变为一个巴尔扎克式、狄更斯式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作家,不仅小说的语言变了,小说的结构方式也随之改变。”

“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,我不禁露出微笑。”毕飞宇认为,在小说里多次出现,引自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这句诗,是打开《千里江山图》整部小说的钥匙,“它让叙事一直处于暴风雨就要来临的压力之下,但不管暴风雨来与不来,地下工作者内心的汹涌早已平息,露出乐观的微笑。”抓住这句话,就找到了读这部小说的办法。

有读者提问:如何避免把这部红色题材的小说引向作为政治或历史的注解?孙甘露表示,有两个概念要慎用,一个是纯粹性,一个是永恒性。“所谓的纯粹性都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,所谓的永恒性一定是具有意识形态含义。这对我们阅读任何文学作品,都是很好的提示。”

当日活动结束后,孙甘露接受了现代快报独家专访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/文  
牛华新 郑芮/摄

## 对话

### 难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

读品:你觉得家庭背景对于你的创作有没有潜在的影响?

孙甘露:当然是有影响的。我父亲是军人,建国初期随解放军南下驻扎在上海,我出生在上海,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。我母亲原来也是军人。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说到战争年代的一些事情,那些牺牲了的战友,经历过的战争,点点滴滴,但也不会像电视剧那样“痛说革命家史”,没那么夸张。但成长在这种家庭,态度、观念、立场肯定是受到影响的。

读品:红色题材创作往往形成了某种经典的套路或者公式,比如“革命+恋爱”。《千里江山图》里也有几对情感关系,你在写作中会努力打破这种公式吗?

孙甘露:我在小说里没有处理这个事情,任何时代、任何人的生活中都会有(爱情)。至于以前影视剧当中脸谱化的那种“革命+爱情”,说实在我也没怎么看过,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。我也不是刻意要在一本书里设置这种人物关系,好像是佐料一样,肯定不是这样的。

读品:小说附录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,读上去是一封情书。

孙甘露:这封信为什么放在附录而没有放在正文?为什么它没有署名?这都是有意图的。读者最先看到的,可能是一封写给爱人的信。当然它包含了感情的部分,但这又是一封公开的密信,这些公开讲的话,你不能只看字面的意思,要结合整本书来看它背后隐含的意思。通过这些结构,这些位置,这些语调语气去揣摩作者的意图,这才是读小说的乐趣。

读品:“红色题材”“主题创作”,会让你在写作中受到限制或约束吗?

孙甘露:任何创作都是有限制的,不管你写什么题材、内容。完全不受限制的写作是不存在的,那样也少了写作的乐趣。说实在的,我也不是要写一个谍战小说,中共历史上的地下斗争比谍战小说精彩得多、复杂得多。我只是选取了很小的一部分,写作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。大家如果因为这个小说对这段历史有兴趣,我觉得就很好了。一部小说涉及的是很有限的。

读品:具体来说,这次难在哪里?

孙甘露:这个故事跟地下斗争有关,它的难度不是小说的难度,而是对待历史的学习。我把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,放在鸦片战争以后近一百年的历史背景中考察。这个历史进程中,涌现了多少人、多少思潮、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,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加艰难的时刻。怎么把这些经验和材料聚拢起来,使它变成小说的一部分,经过了漫长的考虑。它既关乎技艺更关乎对历史的态度。

### 重新成为“初学者”

读品:从您的这次写作实践来看,您觉得谍战类型的写作有门槛吗?

孙甘露:当然有门槛。把自己看成一个初学者,每写一本新书,都是一个新的作者。这种新,是在一个处女作中才会有的那种特殊的质地和声音。把自己看成一个新作者,是试图找到初次尝试的那种新鲜感、愉悦感。如果暮气沉沉、老于世故地讲一件事情的话,是很乏味的,而且可能只是个面具,背后掩盖着某些东西。当然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,因为你都是一个老年人了,你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新人,你也不可能装成一个初出茅庐的人。这只是表达我的写作愿望。

读品:它让你体会到初次尝试的愉悦了吗?

孙甘露:我们江苏的混蛋现在已经风靡全国了,打一打牌给对家,实际上都包含了很多信号。牌本身是不说话,就像书中人物讲一句话,也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,讲话的场合、环境、对象,所要传递的信息是非常复杂的。

像大家熟悉的美剧《国土安全》《纸牌屋》,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什么?我觉得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,怎么把无法讲的话讲出来,把无法提的要求向对方提出来并让对方接受,这是最精彩的部分。这基于对人性非常透彻的了解,也需要运用大量关于时代、文化、种族、风俗的知识。回到书中所写的1933年,在那个年代上海或南京的街头,他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如何前进?这是这个类型的写作当中最有趣味的部分。

读品:你平时会看谍战小说吗?

孙甘露:间谍小说我看过很多,格雷厄姆·格林、勒·克莱齐奥都是间谍小说的大师,他们对间谍世界的了解,对“冷战”时期特殊时代背景的把握,包括在文学叙事上,有很多独到的绝门功夫。类型小说写得好,同样可以成为非常高级的文学。

读品:他们的“秘籍”对你有帮助吗?

孙甘露:每个作者都是一个魔术师在变戏法。我给你看,但你不要跑到我背后去看。你跑到后台来看,这没法看对吧?乱七八糟的,堆满了东西,演员化着妆,戏服还没有穿好,有的人可能在那吊嗓子……演出就是魔术师打下魔术棒以后,一切都安静下来。写作其实也是这样,你在幕后把所有这些东西梳理好,呈现给读者。至于后台的东西,读者不关心的。

### 写作是一场不期而遇

读品:你会介意外界说这是一部通俗小说吗?

孙甘露:不介意。别人把它说成谍战小说也好,主题创作也好,读者有读者的权力和自由,我怎么想不重要。书籍有自己的命运,出版后就由不得你了,不能说别人说的合你心意就对,不合你心意就不对。

读品:你曾说张爱玲是一个“间谍小说家”,她的《色戒》对你有影响吗?

孙甘露:张爱玲小说读得不多,《色戒》我是先看的电影。完整读过的可能就是《小团圆》,当初陆灏编《上海书评》,他约我写篇文章,我就把这书读了一遍。我的意思是,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影响非常大,我也没怎么看过,但这不代表金庸的小说不好,这不是我的态度、评判。

读品:很多评论说,这是先锋作家的一次转场。

孙甘露:你写东西的时候并不考虑这些事情,(考虑)那就没法写了。写作有训练、养成的部分,也有不期而遇的部分。不是说我写好了,我要转场了,我要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谍战小说或者什么。不是这样的。写作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愿望,你并不是清楚最后看到的是什么。正因为不是全然的清楚,慢慢往前摸索才有意思。写作是一个寻找的过程,慢慢的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东西。

读品:距离你写作上一部长篇小说《呼吸》,已经过去了25年。时隔这么多年再写长篇小说,体会如何?你如何看待年龄和写作的关系?

孙甘露: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人是很难改变的,内心最深处东西是改变不了,所以写作是一个蛮本质性的活动,是从你最深处产生,虽然你写的内容不一样。当然变化肯定也是有的,你从青年变成老年,你对很多事物的理解会有变化。老年这个事情,你没经历过你不可能知道,老年身体衰退的那种感觉,每分每秒都在发生,你不到那个年龄是体会不到的,渐渐让你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理解,你在下笔的时候当然是不一样了。



扫码看采访视频